

戰後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發展概況

文／邱貴芬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台灣的女性作家創作在台灣文學史裡原非特別醒目的一個研究區塊，但九〇年代以來，由於眾多女性學者的投入與耕耘，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現今已在台灣文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底下的概述，乃是綜合各家說法，初步梳理戰後台灣女性文學創作的歷史流程。由於筆者以小說為主要領域，因此本文呈現的文學圖譜自有其侷限，疏漏之處猶待其他專家補遺。

五〇年代

根據《台灣小說史論》裡第一章節作者陳建忠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討論，日治時代女作家作品相對稀少。以小說而言，約寥寥十數篇而已。作品稀少，主要因為當時社會條件，不利於女性創作，教育低落，以及接受日本教育使用日文的女作家，未能從三〇年代以前台灣漢文傳統裡去汲取創作的養分，都讓日治時代台灣女性作家的創作難以在質量上有所開展。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許多中國大陸的人口流入，其中不乏具高等教育水準的女性，台灣文壇的性別生態因而與日治時期大不相同。1955年成立的「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員包郭艾雯、徐鍾珮、王文漪、潘人木、張漱菡、林海音、潘琦君、謝冰瑩等，都相當活躍，大大提升了此時台灣文壇女性作家的能見度。根據女性學者應鳳凰在《台灣小說史論》裡的研究，此時《自由中國》文藝欄女作家的傑出表現，堪稱當時女性文學盛行的指標：「以1957年上半年的卷16為例，只見她們密集安打，幾乎包辦了整卷總共十二期的全部短篇小說。整體而言，女作家的大量湧現和女性文學工作者的結盟，堪稱此時期台灣文壇的一大特色，可與日治時期台灣女作家的稀少作為一個對照來探討。

就議題而言，眾多女作家所觸及的議題包羅萬象。范銘如在《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裡指出，這些從中國移居台灣的女作家，不乏具有強烈性別意識的女性知識份子，她們的創作雖也有呼應當時蔚為主流的「反共」、「懷鄉」兩大主題之作，但有些創作卻也開始以台灣為背景，「思量在此重建家園的困境與方法，而非弔念和重返失樂園。」這樣的說法開發了此時期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的一個有趣議題：五〇年代中國來台女作家究竟是以什麼樣的角度來「書寫台灣」？「台灣」在她們的身份和認同想像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當然，這不表示當時中國來台女作家就「心繫台灣」，以投奔自由的心情來迎接她們的「台灣新故鄉」。此時台灣女性創作的另外一個重要議題，即是女作家與主流「反共懷鄉文學」的瓜葛糾纏。潘人木膾炙人口的《蓮漪表妹》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是討論這個議題，不可忽視的文本。《蓮漪表妹》獲得1952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四十一年國父誕辰紀念獎金長篇小說第一名」，轟動一時。「文獎會」於1950年設立，每年定期舉辦各項文藝獎，倡導反共文藝，由於獎金優渥，投稿者眾多而帶動反共文學熱潮。梅家玲解讀這部五〇年代台灣

女性文學代表作，認為這部作品雖然依然遵循主流反共文學的思潮，然而，所有政治上的鬥爭，「都得要具體化為小女子日常生活中的愛欲嗔癡，才具有實質意義。」「關乎千萬人身家性命的神魔之爭，於是被置換為尋常家庭男女的婚姻暴力與危機處理。」（《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頁77）。這樣的談法，似乎顛倒了Fredrick Jameson所言，第三世界文學的敘述都隱含一個「國家寓言」：根據梅家玲的看法，看似「國家寓言」的小說敘述，其實仍然還是演練了女性文學最主要的男女/婚姻/愛情敘述。我們究竟該如何解讀此時女作家的「反共敘述書寫」？這應是研究五〇年代台灣女性文學的一個重要議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以鮮活的語言和獨特的敘述觀點，回溯記憶中的傳統家庭女性，應鳳凰認為，林海音「比任何人更敏銳於時代與社會加諸於中國女性的重壓……這些小說關注的，不只時代或社會，有關注於最普遍的人性。」（《台灣小說史論》，頁147）。

以文體而言，女性成長小說在這個時期逐漸形成一個女性文體，應鳳凰認為，包括上述潘人木、林海音的兩部代表作，和徐鍾珮的《餘音》、聶華苓《失去的金鈴子》都為這個女性文學的重要文體注入了新生命。

六〇年代

六〇年代的台灣最受人矚目的文學風潮，應屬「現代主義」，此時台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戰後冷戰結構，進入「美援」時期，美國文化對於台灣造成莫大的衝擊，以台大外文系一群學生為主要推手的台灣現代派文學蔚為風潮。這時也

是戰後接受台灣教育的新生代作家初次嶄露頭角的年代。五〇年代活躍於台灣文壇的作家多是中國來台，而默默耕耘的本省作家如鍾肇政、廖清秀等，也多是接受日治時代教育的作家。六〇年代的現代派作家成長於冷戰時期，取經西方，反映了戰後西方文學在台灣文學形塑過程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個時期屬於「現代派書寫」的重要女作家包括歐陽子、聶華苓、施叔青、李昂、陳若曦等等。除了聶華苓之外，多數的現代派作家都成長於戰後的歲月，未有流亡逃難的經驗，女作家「現代派」書寫以台灣為主要場域，於女性情慾書寫的表現，特別突出。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是目前「美國華語文學」和「華人離散文學」研究領域的熱門文本，這部作品展現一位中國女性從中國到台灣再到美國的逃亡旅途，對於女主角的情慾著墨甚多，而且寫法獨特，充滿實驗色彩。歐陽子在六〇年代碰觸「亂倫」的議題，引起一陣撻伐。她的作品企圖擺脫女性抒情小說傳統「多愁善感」的情調，改以嚴謹的敘述觀點和冷靜的筆調來呈現角色內心最劇烈的衝突。李昂和施叔青這兩位出身鹿港的女作家把鹿港的怪誕和傳奇帶入小說創作，開闢一條具有獨特台灣在地民俗色彩的寫作路線。綜觀此時現代派女作家的創作，除了碰觸道德禁忌，開發女性情慾書寫的空間之外，在表現模式上更有巨大的突破。在西潮影響之下，女作家不再拘泥於「寫實」模式的展現，時空交錯和各式空間的重疊和互相干擾，開發了傳統線性說故事習慣之外的敘述模式。儘管五〇年代以來以寫實主義為主的女作家創作仍持續在台灣文壇發展，現代派創作的介入，使得女性文學不再與副刊溫情路線緊密掛

邱貴芬

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當代小說、文學理論、紀錄片研究、比較文學等。著有《後殖民及其外》、《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下冊）等專書。



女
聲
專
欄

勾，朝向更知性的寫作路線發展，在藝術形式上也有更多的琢磨。這是這個時期女性創作的一大突破。

七〇、八〇年代

七〇年代在台灣文學史上一般稱之為「鄉土文學時期」，此時反西化、回歸鄉土的呼聲甚高。但是，相對於男作家（如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宋澤萊等）的傑出表現，女作家的「鄉土文學小說」似乎到了八〇年代之後才逐漸成熟。七〇年代是瓊瑤和三毛盛行的年代，兩位女作家所營造的愛情與浪漫和當時男作家鄉土文學尖銳的社會寫實批判，大異其趣。在這個時期女性鄉土文學作家的代表，大概以季季表現最突出。六〇年代現代派陣營的陳若曦在1970年代中發表了一系列的中國文革小說，也在台灣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但是這些小說與台灣「鄉土文學」的交集在哪裡？卻是需要仔細處理的問題。1976年之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分別設立文學獎，許多年輕女作家透過文學獎成為文壇新星，帶出一波被稱為「閩秀文學」的風潮。朱天心、朱天文、袁瓊瓊、蘇偉貞、蕭麗紅等堪稱此時期代表作家。除了蕭麗紅的小說以鄉土詞彙呈現台灣傳統社會女性生活之外，這些女性作家以「都會小說」見長，袁瓊瓊和蘇偉貞都擅長愛情與婚姻問題的鋪陳。蕭颯和李昂以較犀利的手法來剖析台灣社會問題，是閩秀文風之外的路數。張誦聖認為「從七〇年代中期開始大約時至十五年的光景，副刊取代了六〇年代的菁英同仁雜誌，成為掌握『嚴肅』文學生產的主要體制」（《台灣小說史論》，頁282），「中產階級小說」的興起，與副

刊此時舉足輕重的地位關連密切（頁298）。女性閩秀文學的風行可以放入這樣的歷史脈絡裡來理解。另一方面，這些女性作家創作主要以「此時此地」的社會男女為主題，在某一程度上也反映了鄉土文學論戰強調「回歸現實」的主張餘波蕩漾。除了小說方面的表現，值得一提的是，在以散文書寫模式呈現的報導文學裡，我們看到了女作家積極的介入，開發了後來逐漸發展成形的台灣「自然寫作」的源頭。一般認為，女作家韓韓和馬以工1980年1月1日在《聯合副刊》刊出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是台灣「現代自然寫作」的里程碑。吳明益說明台灣自然寫作和鄉土關懷的密切關係：「早期的台灣自然寫作者，多數是由這種對本土時局、土地上的存在物、歷史記憶的新開始，最終走向提出新倫理思考的道路。他們以另一種模式去重新發現/建構台灣的土地/歷史」（《台灣自然寫作選》「前言」，頁15）。這條「自然書寫」的路線異軍突起，承續了鄉土文學所標榜的「土地關懷」，卻又開發出一條深刻的「倫理」省思路線，值得注意。

九〇年代

九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小說的一大特色就是身份認同政治的探討浮上檯面，而且對於歷史敘述的虛構性具有高度自覺性。解嚴之後戰後國民黨極力建構和傳播的中國國族歷史敘述與文化想像受到本土化運動的嚴厲挑戰，台灣歷史敘述重整的結果，「記憶」和「歷史」如何可以挪用和操縱，往往成為話題。這時期台灣國族認同的矛盾和衝突幾乎主宰台灣文化場域的討論，女作家也紛紛加入這波認同交鋒，以重塑歷史記憶來回應

台灣身份認同論爭以及挑戰官方（國家）敘述的小說紛紛出籠。李昂的《迷園》、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平路《行道天涯》、賴香吟的〈翻譯者〉，都是代表指標。「眷村小說」也在此時冒現。梅家玲如此歸納眷村小說的主題：「從因緣聚會寫到星散蓬飛：從一意期盼反攻還鄉，寫到終究自甘（？）老死於台灣，從瑣記眷村兒女的愛戀心事、鄰里是非，到辯證家國歷史、反思記憶想像，甚至操演情慾政治」（《性別？還是家國？》）。有趣的是，許多書寫眷村小說的女作家原都是八〇年代「閩秀文學」的代表作家。為何同一群作家會在八〇和九〇年代分別以如此不同風格來掀起台灣文學風潮？這是台灣女性文學史上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除了這些以記憶和家國政治為重點的小說之外，女作家切入議題的創作也不少。最引人注目的應是女同志小說的興起，此類小說不以當代吵得熱鬧滾滾的「國族」認同為關懷重點，而是在創作當中挑戰「性別認同」的疆界。其實遠在六〇年代歐陽子的小說裡，我們即已發現女性之間曖昧情愫的複雜刻劃。但是還是要到九〇年代身份認同政治大開大放，專注於女人之間情愛的小說才蔚為風潮。邱妙津、陳雪、曹麗娟、洪凌等，都是這類小說的代表作家。另外一類引人注意的女性小說則是以現代都會戀物消費為主軸。朱天文和施叔青是此類創作的代表作家。劉亮雅談朱天文被視為台灣後現代作品代表的〈世紀末的華麗〉，認為女主角「不斷地變裝變身，情慾對象也在同性異性之間搖擺，展現出後現代去歷史與國族、重視感官和表層以及流動的身份。全篇幾乎以服裝廣告串連，時間記憶繫乎時尚的變

化；愛欲關係被唯美頹廢的感官所滲透，甚至不及時尚的重要性。」（《台灣小說史論》，頁362-363）。這段話大致可讓我們一窺女作家後現代小說的特殊風味。

整體而言，此時期台灣女作家小說的一大特色就是文學與身份認同理論高度互相呼應。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作品與「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贊成或反對某種認同（無論是國家、或族群、或性別的認同），其中的曖昧糾纏反倒是別有趣味的地方。另外一個必須注意的地方是，作家與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定，同一個作者的不同作品可能對同一個議題有不同的回應和處理方式。

兩千年之後，女性創作的版圖仍有待觀察。比較確定的是，雖然一般文化觀察者認為，報紙副刊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然而，在文學創作的發表管道而言，副刊的文學獎仍然舉足輕重，對於「文學作家」頭銜的取得，仍具決定性的影響。網路的興起，固然開關了一個較不受一般傳統文學標準篩選的空間，但是，網路作家究竟在「文學」這塊領域裡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和挑戰，目前仍狀況未明，應是台灣女性（文學）研究一個相當具有前瞻性的課題。✉